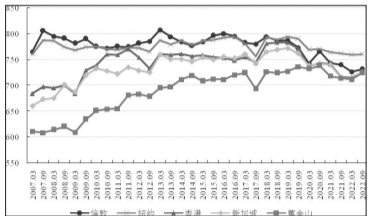


#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降了吗?

陈奉先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日前发布的《2022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2022年香港的竞争力排名为全球第5位。英国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于今年9月21日联合发布的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香港的总排名为全球第4,较上期已下跌1位。在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中美贸易摩擦以及香港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的迭加冲击下,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衰落吗?



全球排名前5金融中心的平均得分变化图  
数据源: 历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  
答案是否定的。香港的核

心优势依然保持,香港的金融中心位置不会被动摇,也不会被投资者放弃。

首先,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得香港成为连接内地和国际信任的桥梁,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资本交汇点和缓冲区。这是新加坡,以及上海、深圳等中国内地城市都无法比拟的。而且随着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和特区选举制度的修改完善,全球投资者和驻港机构的疑虑和担忧也进一步被消除。一个左证便是,即将于11月份在香港举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将汇聚100多家全球重要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超过30家机构由集团董事长或行政总裁代表,涵盖银行、证券、资产管理、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对冲基金和保险等各种金融类型。另据数据显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两年多来,香港的新股集资额超过6500亿港元,比实施前同一时期增加超过三成;2021年,港股平均每日成

交额达到1667亿港元,较2017年提升89%;2021年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增加9049家,创历史新高,国际金融机构纷纷扩大在港业务和员工规模……可见,国际商界对香港未来投下了信任票。此外,香港依托区位优势,与东盟合作日益密切,双方的贸易额稳步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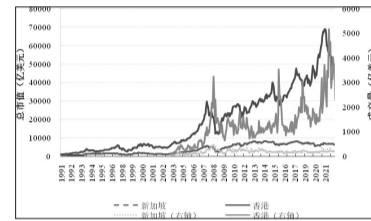
其次,大河有水小河满,中国内地的快速发展始终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最大底气。中国内地14亿人口的庞大消费需求、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巨大投资需求、发展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的产业发展需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释放的政策红利、中国内地向“内循环”的经济转型都会为香港经济转型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与强劲动力。

最后,香港不仅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会计、监管等制度,低而简单的税收,廉洁高效的政府,多元包容的社会文化,还有丰富的人才资源、雄厚的科创实力、享誉全球的争

议避免及解决服务,香港成为连接内地联通世界的金融、航运和贸易枢纽。众所周知,香港既是内地吸纳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台、中国内地对外投资平台、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枢纽,也是主要的集资融资中心、亚洲顶尖资金管理中心、世界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顶尖的银行业和稳健的保险市场。

有观点认为新加坡很快会超越香港,成为亚洲第一的国际金融中心。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标配”。就股票市场而言,相比于新加坡,香港的股票市场无论是交易量还是市值都大的多。2022年6月香港股市总市值为49789.54亿美元,新加坡股市总市值6225.89亿美元,香港股票总市值约是新加坡的8倍。而且香港的成交量远超新加坡。2022年上半年新加坡股市电子订单总成交量为1246.82亿美元,而香港同期资料为15747.15亿美元,约为新加坡市场的

12.63倍。从债券市场来看,2021年香港交易所全年债券共筹集1.55万亿港元,而新加坡交易所2021年全年债券共筹集2.49万亿港元。从表面上看,新加坡市场胜过香港,但由于香港服务于中国内地,这是新加坡无法动摇的优势。外汇市场上,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19年12月新加坡的外汇日均成交额为6398.687亿美元,香港为6321.079亿美元,略低于新加坡。但是香港的人民币市场比新加坡大很多。2022年6月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8150.29亿元人民币,而新加坡为1730亿元人民币。综合来讲,在股票、债券、外汇各个市场,香港金融业都强于新加坡。



股票总市值与成交量



人民币存款余额  
数据来源于:Wind

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加强创新科技发展的顶层规划和战略设计,制定系统的产业支持政策,加快培育壮大本地企业,同时吸引全球企业、人才等资源集聚,建立创新科技产业生态。同时,也应以长远战略推动产业“向实”发展,“做实”产业结构,可以考虑引入中国内地和国际高端先进制造项目,与香港的创新科技充分结合以提升香港经济的韧性和活力。最后,通过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也是开启香港经济新篇章、维护金融地位稳定的重要一环。背靠中国内地,面向世界,相信香港会再次腾飞,“东方明珠”将更加璀璨!

## “最成功的失败国家”在内耗

廖省·林越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很多国家卷入战争漩涡,死伤惨重、满目疮痍;作为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孽孽深重。不过,他说的这句话:“宁做最成功的失败者,也不做最失败的胜利者”,有效激发“一战”后忍受屈辱的德国青年的怒火,不顾一切走向战场。历史也给希特勒取了个封号——“最成功的失败者”(The most successful loser)。

而近代的比利时,因按法语、弗拉芒语等语言划区,造成彼此不信任,多数决策都是各自地区作出的,联邦政府无法治理,故被称为世界“最富有的失败国家”。

英国《金融时报》10月6日刊文:“美国是史上最成功的失败国家”,强权衰落的一个关键迹象是其货币贬值,就像古罗马一样,英国也可提供一些教训。按这个标准,美国已开始走下帝国巅峰。美国本不应陷入这种瘫痪,但美国蓝州与红州之间的文化鸿沟令人费解;而三权分立已呈现腐朽,最高法院现在是“第二个立法机构”。

今年8月中旬,先是民主党内“相互甩锅”。围绕佩洛西窜台一事,白宫表示这纯属“个人行为”“管不了”,佩洛西则说“出访是遵循总统亚太政策”。再是两党之间“斗争升级”,前总统特朗普日前被联邦调查局突袭“搜家”,是美国建国以来首例。特朗普和共和党猛烈抨击拜登政府搞政治迫害,美式政治呈现劣质化、病态化。

专家评析,美国政治制度有四大矛盾和弊端。一是政客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间的矛盾。美国政客为了胜选必先考虑选区的利益,而国家利益次之。二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间的矛盾。美国是世界上选举最频繁的国

家,政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竞选或筹备选举,首要目标就是赢得选举,一切言行都以选举为纲,无视美国长远利益。

三是国会和行政部门间的矛盾。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频频让政府陷入瘫痪状态。国会不断侵占总统的外交权,介入外交政策的制定,导致“政出多门”,削弱美国国际信誉。四是美国两党间斗争极化的矛盾。近50年来,美国的竞争已达到历史高峰。两党几乎能把一切问题政治化;多位历史学家警告拜登,美国已走到内战边缘。

特朗普被“搜家”,将政党斗争推上一个新的极端。他怒斥:“这类突袭只会发生在失败国家。可悲的是,美国现在已沦为其中一员,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堕落。”他是否意识到,真正让美国堕落的,正是他们这些以党争为业、以谋私为荣的政客们?

媒体10月7日报道,美国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周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称每天有大量非法入境者从德克萨斯州涌进纽约市,造成“人道主义危机”。自4月以来,已超过1.7万名寻求庇护者抵达纽约市,多是共和党州组织运来的。

纽约市市长要求“所有相关城市机构协调努力,应对寻求庇护者的人道主义危机。”纽约市每天平均有五到六辆公共汽车运送寻求庇护者抵达,他们需要长期援助。亚当斯表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将使城市官员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提供所需的援助。

撇开共和民主党的州故意把非法移民送到民主党的州,我们回过头再看最高法院如何插手“立法”的事吧!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他们利用已去世的开国元勋为自己的立法行为辩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自由派最高法院开创“法官立法”的先例,如今共和党控制的最高法院更是效法积极“参政”,美国法律已混淆于政治表演。

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失去对国会的控制,在未来两年,世界将再次看到执政瘫痪的情况,这是政府无能的表现。拜登数月以来因“俄乌战争”油价、粮食涨价的意外成果,都将被下一任共和党总统抹煞,不管新总统的名字是不是特朗普。

“两个美国”间的敌意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思维,这使美国宪法成为了沉重的负担。特朗普曾在2020年获得47%的选票,而今天的美国,选民的流动性更不可估量。

英国天空新闻消息,特朗普9日在亚利桑那州梅萨市的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讲时,播放一段时长约2分钟的视频。“看看这个……来看看——你们甚至都不敢相信”,特朗普在播放前说。随后,大屏幕上出现拜登在多个公共场合失言失态的画面。《每日邮报》报道:“特朗普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嘲讽拜登。”

《纽约时报》称,选举进入一个月倒计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竞选集会密度加大,广告铺天盖地,充满揭露和攻击对手的激烈言辞。对于在美国参众两院只占微弱优势的民主党来说,守住控制权绝非易事。这次中期选举的“内耗”举世瞩目。

过去两年,美国的全球实力因积极拉拢盟友而有所增长,但它的“单边优先”“美元霸权”也引起很多国家的反感。美国仍然在世界上大步前进,但它的“七寸”罩门已经暴露无遗,连英媒都敢称其为“最成功的失败国家”,这是在“恭维”吗?

## 别人的眼光和看法

夜笔悟者

芸芸众生,无论是上至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下至草莽江湖的贩夫走卒,能够不被他人眼光、看法和价值取向等左右者,委实是凤毛麟角。这并非源于他们作为社会群体化一员,难免会受到他人物质与精神熏染所产生的化学反应,而是因为自身没有通世方外之人的无欲无求,自然在潜意识深处,将自己的知与行,慢慢地向大众化方向所靠拢,所以忘记初心,没有活出真我或者活出的仅是别人眼中的“我”,也就在所难免。

从医学的角度讲,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与看法,甚至违心的去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以谋求他人的认同,继而获得自己心理受用的错觉,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自我意识。这种人的心理防线极为敏感脆弱,自我保护意识很差,害怕被人审视,害怕自己的缺陷在别人的眼光中成为众矢之的——虽然这些隶属于潜意识层面的东西,有些人穷其一生也无可晓。

人是环境的产物,无论你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也无论你是否孤身一人,只要你心有所求,无论是财富名利还是地位,你都会不自觉的“借鉴”他人的成功历程,“抄袭”他人的成功模式或套路,按照他人的价值取向来给自己做出成功标准,甚至在他人言语不断的洗脑之下,来进一步“完善”和提高自己,使得自己也能赶上成功的坦途,直至你最后可能侥幸的活成了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不得不说,虽然这是一种看似无奈且被动的人生,但却是几乎所有人都渴望和艳羡的,哪怕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并没有活出真的自我。

在以物质为主流导向的社会里,坚持活出自我,活出独一无二的美感,不

为他人的观点和看法所左右,那么这个人的生存几率,可以说微乎其微。这并非一种人喊打的悲观论,因为人是群体生物,作为群体生物的最重要属性,就是“合群”。你想在社会上安身立命,自然要得到上级下属和同事的认可,但如果你整天生活在他人否定之中,生活在与其他人利益相冲突的环境里,别说你很难继续开展工作,很可能他们集体“罢黜”出门。

说到底,坚持自己的观念不是坏事,与周围人的价值观“同流合污”也不是坏事,在不影响自我价值判断的前提下,被他人的看法眼光所左右也并非坏事,真正的坏事是假如作为商家的你,听到张三说明天有雨便订购了大量的雨伞,又被李四告知明天没雨,于是又取消了进货雨伞的计划。

就我个人而言,源于对自身的深度觉解,所以向来都在将自己的受想行识与心底深处的愿景有机共融,从不单纯的为了利益的驱动,而受控于他人的眼光和看法;这也造成了周边一些人对我行事做人的误解,以为我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毕竟他们在这种常情判断之下,也算得上是一种“常规”操作。直至多年之后,他们才蓦然惊觉,当初对我做出的观感,委实是大相径庭的误判。甚至幡然醒转,如能效仿像我的这样做人行事,也是人生正确走向和良好价值的体现。

听信他人言语,本身并没有对与错之分,但是我们要学会鉴别,他人看法中,往往有些是偏知偏见,但也有些是真知灼见,所以我们也要学会分析和判断。活出真我不难,难的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这条路或许是他人从未走过,但对你而言,无异于是康庄大道。

## 司法界和法学界的华人律师 (1)

尤·温·奥布颂古(YU UN OPPUSUNGGU)



法学院落成仪式(1924) PEMBUKAAN SEKOLAH TINGGI HUKUM (1924)

据历史记载,华族是印尼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族群之一。殖民政府在教育领域实行歧视政策时,华人便自发兴校办学。所以当时印尼第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华人也不足为奇。

努山达拉群岛就像一个生气蓬勃的竞技场。上世纪初,这块赤道上的翡翠沦为荷兰人谋求经济利益的殖民地。当苏加诺-哈达(Sukarno-Hatta)宣布印尼独立时,竞技场上的游戏规则有了改变。要实现完全独立的印尼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因为这

时印尼正在打造一个统一的民族:即整合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分化的社会(民族建设),塑造坚韧的民族性格(性格建设)和发展经济(经济建设)。

除了那些阻碍因素,历史及社会的推动力量随后成为印尼所有法律学术的发展导向力量。其中不乏有华人的身影。在这场斗争中,华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各自的成就与才能勇敢地迎接上述的挑战。这篇文章主要记录了他们其中几位在学习法学或后来决定作为学术人员或司法实践者投身法律

领域的经历。

从教育谈起

20世纪20年代,荷属东印度只有三所高等学校,分别为位于万隆的理工高等学校(现万隆工学院的前身)(Technische-Hoogeschool)以及位于巴达维亚(现雅加达)的医学院(Geneeskundige Hoogeschool)和法学院(Rechtshogeschool或RHS)。

为了满足法院的人才需求,西冷县县长侯赛因·查亚迪宁腊(HuseinDjadiningrat)提出开办法律教育。随后,1909年在巴达维亚(现雅加达)成立法律学校(Rechtsschool),印尼法律教育从此萌芽并逐步发展。1924年10月28日,法律学校升级为法学院(Rechtshogeschool或RHS)。经过不同阶段的变化,法学高等学校(RHS)成为今天的印尼大学法学院。(http://www.ui.ac.id/id/profile/page/sejarah) 高等教育法(Hooger Onderwijs Wet, 1924年10月9日

第1号法令,1924年第457号国家宪报)规定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在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然而事实上只有少数出身贵族的印尼人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他们,最先接受高等教育的是华人。印尼最早有理工、医学和法律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情况大体如此。

临近20世纪10年代末期时,巴达维亚法律学校(Sekolah Hukum)的毕业生继续深造攻读法学硕士学位(Meester in De rechten);他们大部分在荷兰莱顿大学学习,高财盛(Ko Tjay Sing)就是其中一员。丹尼尔·列夫(Daniel Lev)(2011:67)认为,当时的爪哇族法学士普遍有机会成为法官,而华族法学士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当律师。打从荷兰回来,高财盛就与著名的民族主义者萨托诺律师(Mr. Sartono)合作,从此开启了他的法律界职业生涯(Suryadinata, 1995: 62-63; NyakWali, 1985: 76-94)。后来他又与帕萨夫·马

托古苏莫(Besar Martokoeseomo)以及他的叔叔高厥忠(Ko Kwat Tiong,又名Mohammad Saleh)合作创业(Lev, 2011: 67; Suryadinata: 1995: 138-139)。他们是印尼律师行业的先驱。(Lev, 1980:121-123)

值得注意的是,从法学院毕业的华人中也有女性后来成为律师。其中一位名叫陈黛西/慧娘(Desiee Tan,又名HoeiNio)。1931年,从法学院习俗法专业毕业后,她进入著名的巴达维亚峇厘(Balie van Batavia)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年后,22岁她考取律师资格证书,成为一名执业律师,[详见秀耀简(Sioe Yao Kan)http://www.ci-hc.nl/uploads/images/page\_image/7.Desiree\_Tan.pdf],一举成为荷属东印度最年轻的甚至可能是第一位女律师。

后来,殖民政府专为其他族群增设了许多法官和检察官的职务。李运福(Lie Oen Hoek)从法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

起初他在武吉丁宜和梭罗工作(Suryadinata, 1995: 82; Oei, 1995:26)。后来他成为武吉丁宜地方法院(Landraad)的法官(Suryadinata, 1995: 82)。日本占领时期,他担任沙拉迪加(Salatiga)地方法院院长(Han, 1998: 441)。独立运动时期他担任雅加达特区地方法院的法官,并在后来晋升为高等法院的副院长(LihatLubis, 1970: 31-32; Oei, 1995:26)。

据记载,在日本占领时期之前,饶庆丰(Jauw Keng Hong)曾担任三宝壟的地方法院(Residentiegerecht)和巨港的司法局(Raad van Justitie)法官(Suryadinata, 1995:47)。至于检察官一职,荷属东印度总督曾将林群明(Liem Koen Beng)提拔为泗水司法局的检察官(Suryadinata, 1995: 91; Setyautama, 2008: 205)。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